

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

张晓晶

◆编者按

今年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收官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年。展望“十三五”,我们需要深入总结“十二五”时期的发展成果和经验,精心谋划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的发展蓝图。本版今起推出展望“十三五”系列文章。

此外,中国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归纳起来,一个是体制结构,涉及国有与非国有、体制转型与双轨过渡、中央地方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等;另一个是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增长动力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等。正是因为存在着一系列的结构问题,并且还处于结构剧变的过程中,这使得结构性调控变得非常有必要。

对于体制结构问题,鉴于经济转型还未完成,存在着双轨过渡,与之相应的是形成双轨调控的思想,即行政性调控与市场化调控并用。经济结构问题的存在,使得结构性调控与总量调控并重,有明行政性干预色彩和结构性调控特点的产业、贸易政策、汇率政策、资本管制、严格的金融监管和平衡财政等政策,均为促进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进入新常态,体制结构问题会逐步减弱,但经济结构问题却仍会长期存在。因此,结构性调控仍然不可少。

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要综合发挥规划、财政、货币政策的“三驾马车”作用,并探索新的激励机制,重启地方竞争

在中国,马上就要开始的“十三五”规划和世界上通行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共同构成了宏观调控的“三驾马车”。这种由规划、财政、货币政策构成的“三位一体”调控模式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强调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并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协调配合”。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连一些发达经济体也开始强调战略规划,产业政策,不再像以前那样把政府的这些做法看作是对市场的一种扭曲,可以说与中国的做法是暗合的。美国学者杰弗里·萨克斯明确提出有一种思想,被华盛顿视为异类,但值得深思。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依赖公共投资的“五年规划”,该规划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管理。美国没有类似的机构,或者确实没有系统性地负责公共投资战略的机构。但如今所有国家都需要五年规划甚至更多:它们需要20年、跨越一代人的战略以构建21世纪的技能、基础设施和低碳经济。

宏观调控新常态,就是要充分发挥规划、财政、货币三大调控杠杆的合力,既关注短期波动稳增长,又兼顾长远促改革。具体来说,要加强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充分发挥国家发展战略对政府公共预算安排、金融资本运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合理配置等政策措施的综合协调作用。规划主要是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重要的着力点,很多规划、投资项目是与预算安排直接挂钩的。因此,制定规划的时候,应考虑到财政能力以及支出结构。同时,货币政策的松紧也要与规划目标相适应。再有,财政、货币政策也要与发改委的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比如,发改委的产业、价格等政策直接牵涉到财政政策的预算安排与税收优惠,而发改委的价格改革可能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立场。

2015年初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就是各地纷纷下调GDP目标。在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出现这样的情况应

属意料之中,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一大进步。但下调GDP同时出现的还有其他一些现象,就是地方不作为。

估计很少有人会赞同“不以GDP论英雄”就是根本不要GDP。关键是这一新指挥棒只指明了竞争的方向,而没有提供竞争的激励。因此,重启地方竞争,还需要在增强正向激励上做文章,关键是理顺中央地方权责关系,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地方上没有动力去做事情,很大程度上是与没有财力和缺乏自主权有关。这是由中央地方权责不清或者权责划分不合理造成的。为此,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一是扩大地方立法权,使之能够酌情处置地方事宜。《立法法》的修订赋予区地方立法权,可以让地方根据本地具体情况,科学地、有针对性地制定地方性法规,有利于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解决地方的实际问题,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中央政府部门应进一步集中其财力的使用方向,减少专项转移支付,也相应降低对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地方政府亦要集中其财力使用方向,从而事实上增强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三是允许地方政府在不违反国家政策统一性的前提下,结合本地实际,开征部分地方性税种。四是推进消费税改革,在征收上从生产环节后移到零售环节,并改由地方征收。消费税原来百分百归中央,现在考虑能否划归地方(或者主要归地方)。这样,地方将可采取一系列激励措施促进消费。这些措施包括如何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本地的消费环境(自然环境也可以纳入进来,因为这样可以吸引外地人到本地消费,增加税收)等。五是提高地方在增值税中的分成比例。目前增值税的中央地方分成比例为三比一,可否考虑调整为五五分成,从而扩大地方财权、激发地方活力。

另外,经济进入新常态,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也在发生变化。30余年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不但越来越激烈,而且越来越理性化了。宏观调控需要承认这种利益博弈,特别是要了解,一项调控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并且,调控政策出台后,考虑到被调控方的反馈作用机制,宏观调控的效果可能会打折扣。因此,新常态的宏观调控应具有博弈思维,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需冷静观察、谨慎从事,思考博弈各方的利益诉求和他们的可能反应,在加深对宏观调控微观基础与运作机制理解的前提下,尽量做到调控政策的“公允”与“有效”。

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要通过决策与实施的机制化,来防止宏观调控的“泛化”“任性”和没有“规矩”



苏抱琴

所当然。这一代的父母大都成经济困难,对子女较尽心,人到中年,不惜一切代价只想为孩子打造一个锦绣前程——不必拿懂事的优秀孩子说事,因为那毕竟是少数,而这才更普遍。前期还看到一个段子:“三个国家的孩子在饭桌上”,说韩国的孩子吃饭时从吃到尾主动服务,中国的孩子被大人催着吃着饭,美国的孩子跟父母是平等的关系……三种场景里的中国孩子也很典型化。

一百年前,西学东渐,“五四”一代孜孜致力于对国学的推翻。就我自己来说,出身于一个乡间的日式家庭,从小感到来自长辈的压力,所以我的观念,还是赞成一百年前已在倡导的个性解放,对影响深远的儒家文化一直持保留态度,尤其对它的仪式文化和等级观念,更是难以接受。所以对近年热炒的国学——不管是来自孩子所在的校园,还是各种社会组织——都一直不感兴趣,以为这复古潮流要么是跟风,要么是老夫子们食古不化。直到前不久,我给几个小孩辅导写作课,偶尔提及一些人物,不管是英雄还是恶棍,是伟人还是圣贤,他们大都一个态度:拿来取笑。而且我发现这个特性并不仅仅表现在这几个小孩身上,而是已经成为新

新人类的一个共性特征:消解价值,泛娱乐化,内心丧失了对人对事最起码的敬意。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古代东方在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之下,从上流社会到普通民众,通过伦理纲常的观念形成了社会的公序良俗,这秩序有其束缚性,也有其文明性。新的时代,自应有新的与之相适应的价值标准。然而现在看,历经一百年的变革,我们的孩子已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正如在《亲亲,我的宝贝》中所呈现的,新一代与父母间不再是我小时候,或者韩国孩子们那样尊老敬老的态度,也没形成美国孩子跟父母那种平等互助的关系,而是大多成了超级自我中心,对他人较少体谅,而且好像没有什么不可以拿来取笑,没有什么是不可亵渎的……这样一种情形,是令人担忧,应该引起注意的。

孩子放大自我,大都源自孩子少,加上父母小时候生活艰难,现在条件好了,要力所能及地给孩子创造优良条件,衣食住行学,哪一样也不能落下,推着拉着往光明大道上奔,结果却适得其反;泛娱乐化的共性,则与当前的社会背景有关,看看现在的各种电视节目、网络游戏和差不多人手一套的漫画书、校园小说,无处不在的娱乐元素合力

宏观调控实质上是政府对市场的某种干预,这种干预必须建立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按市场规律办事。宏观调控新常态就是要按“市场决定论”作为基本出发点,推进市场化改革,夯实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完善政策传导机制,更多地依靠市场化手段调控经济。

过去我们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宏观调控“泛化”。一方面,在经济体系不完善,还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手段解决问题的時候,人们会想到各种招数,比如土地闸门、信贷闸门,有时候“乌纱帽”也用上,然后发现这么做很“有效”。但另一方面,随着宏观调控的泛化,往往会对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本身形成制约,从而不利于市场机制的真正形成,这反过来,又为宏观调控的泛化创造了条件或“借口”。或许总是处在宏观调控之中,亦或许是总想“依赖”宏观调控(比如经济不好的时候指望刺激),除了某些部门认为宏观调控是万能的,连一般的市场参与者,被调控的对象也以宏观调控能够包打天下。事实上,宏观调控的最高境界是人们感受不到它的存在(所谓“润物细无声”)。那些指望经济中的大事小情,如有个波动,出个行情,都要靠宏观调控来解决的想法是有问题的。宏观调控不能包打天下,特别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今天。

因此,我们必须实现宏观调控决策与实施的机制化,这样才能做到以不变应万变,才能有定力,才能谋定而后动。缺乏机制化,就会眉毛胡子一把抓,各种政策频频出台,各个部门一起来,各类工具一起上,甚至会以情况特殊为借口,突破一些常规限制,这就使得宏观调控非常“任性”,造成以后的被动。一是问题成堆难“消化”;二是没能提供一个正面、好的遵循,再以后仍会这样“任性”下去,没有“规矩”。

另外,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举一动对世界产生的影响都是无法忽略的,比如近期的亚投行及一带一路战略,就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国际政策协调和敦促各国履行负责任的经济政策。首先,加快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密切跟踪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变化,认真评估分析其对我国宏观经济和政策实施的影响,主动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调和沟通,更加积极地参与多、双边国际经济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治理结构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更加公正合理,营造于我有利的制度环境,拓展发展空间,维护开放利益。其次,敦促各国履行负责任的经济政策。一方面,关注世界发展的中国因素,即中国无论是发展规划还是宏观政策的制定,都需要将其对外部世界的潜在影响考虑进去。尽管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的事自己管,但中国的政策不再是中国一家的事,这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意识。宏观调控新常态要有全球视野,合作精神,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中国的政策既对中国经济负责,也对世界经济负责。把中国经济搞好,就会为各国创造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多正面外溢效应和“正能量”。另一方面,关注外部因素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要求相关国家也要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比如美国,就要关注本国经济金融政策的外溢性影响(如货币政策正常化可能带来的全球性冲击),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我们自我约束,也需要一定的机制(如G20等)相互监督和协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学林漫笔



与教育
民国治学

学人诗趣

王学斌

民国时,赋诗已不再时尚,但仍有很多学者作诗唱和,趣意盎然。

传统学术乃一整体系统,故而古之学人除遍晓诸经外,尚需吟风浓墨,达至诗书双绝。清末以来,随着科举废除,往昔凭依制度优势维持的传统学术趋于边缘,士绅阶层终渐溃灭,赋诗不再是时尚。然民国仍不乏学者作诗唱和,趣意盎然。

当年章太炎初出茅庐,担任多家报刊编辑,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充分施展才情与思想。直到1903年,章主笔《苏报》,一改该报以往保守立场,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主张。在一篇文章中,章氏以词牌的形式对慈禧太后奢华铺张的寿典进行冷嘲热讽:“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入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岁祝疆无。”

辛亥后,虽已从政坛隐退,但章依然关注政局民生,一有机会便抨击时弊。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灵柩运到南京。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时,章专程来到南京吊唁。想起沿途所见所闻,他深感许多革命党人已腐化变质,心中很是气愤。章是革命元勋,达官贵人们自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席间,有人附庸风雅,请他题字留念。他有感而发,挥笔写下对联一副:“诸君鼠窃狗跳,斯君痛哭;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众人见了,面面相觑,但碍于章的元老身份,又不能发作,只好任凭章太炎的数落了。

师侍诗文风骨峥嵘,自成一体,徒弟弟也不遑多让。在中央大学任教时,黄侃同时在金陵大学兼课。金大农学院院长某君,刚从美国获农学博士头衔归来,炫耀不可一世。一日,他忽来雅兴,宣布在大礼堂公开表演“新法阉猪”。海报张贴出来,大肆宣扬,轰动全校。那日,前去围观的学生特别多。黄碰巧当天也有课,他走进教室,发现只剩下稀稀拉拉几个人,知道学生都被“洋博士”吸引去了,便说:“今天上座不佳,大家是不是去凑一下热闹?”剩下的同学欣喜万有,都高兴地往外走。黄平生对“假洋鬼子”教授素来瞧不起,这回“新法阉猪”的宣传,使他也起了怀疑,便道:“好!咱们也一起瞧去!”

谁知道进大礼堂一看,一只活生生的猪,被紧紧缚在手术架上,肚破腔开。这位院长因所学的洋玩意儿不到家,手忙脚乱,却始终找不到猪卵巢的部位。阉猪变成了宰猪,旁观者笑成一团。黄侃看在眼里,笑在心上。回到课堂上,他即兴填了一首词:“大好时光,莘莘学子,结伴来都。佳迅竟传,海报贴出;明院长长表现阉猪。农家二鹿幸其一,捆缚按例阶除。”

阉院长,卷袖操刀,试试功夫。渺渺卵巢何处?望左边不见,在右边乎?白刃再下,怎奈它一命呜呼?看起来,这博士,不如生屠。”

这阉词嬉笑怒骂,滑稽至极。全校争相传诵,读者无不捧腹。这位当众出丑的院长,自然耳闻,羞愧难当,只好悄悄辞职而去。章氏另一得意门生钱玄同曾认为中年以上的人趋于固执和专制,因此愤言:“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胡适闻后,就开玩笑说:“好!等你到了四十岁,我就送你一首诗,叫做手枪。”果不其然,胡适后来真的作了一首“亡友钱玄同先生诞辰周年纪念歌”,写在寄给钱氏的信中,其中有这几句堪称戏谑至极:“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可惜我不在场,不能来监斩你!回家挖下一坑,好好睡在里面。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

鲁迅亦写下讽刺钱玄同的一首诗:“做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担辩证法。”上句讽刺钱玄同自身已经固步自封,哪有资格说别人因循守旧?下句则是警告钱玄同,马克思主义必当成为日后中国的主流理论,这并不是你一两钱玄同所能抵挡得了的!也就从此刻起,昔日的战友彻底转化为敌人了!

若说到写诗,自然不能落下民国第一打油诗高手刘半农。虽整日舞风弄月,但对于那些苟且偷生、尸位素餐的无耻之輩,刘亦绝不放过,痛骂戴季陶便是最好一例。1934年4月11日,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即戴季陶)从西安发出致中央研究院蔡元培等人的通电云:为保护古墓古迹,培植国民道德,请一致禁止学术团体随处发报,以免破坏民族历史云。值得玩味之处在于,“蔡院长”排在发报的第一位,其次才是行政院长汪精卫、教育部长王世杰等人,这明显是对蔡元培的“骂山门”。戴传贤反对考古学家发掘古墓,虽也反对私人掘古墓,但后者只是陪衬。

一周后,蔡元培发表《致戴传贤》的公开信,指出学术机关考古发掘的实况及其对民族历史的贡献,并指出古墓古迹的破坏,主要由于中外古玩商人与地痞土劣的操纵,以及地方机关的暗中勾结。对戴氏的禁止发掘古墓,认为“当出之以慎重。”行政院最终的议决案,还是依了蔡先生,宣告戴传贤的挑战失败。

刘半农恰是考古学术机关成员之一,加之个人与蔡元培私交甚笃,无论何都要说几句公道话,替蔡院长助阵。于是挥笔写成《元旦精华——南无阿弥陀佛赞》一文。此文一开头,刘半农即写讽刺诗道:

“赫赫院长,婆尸羯帝!胡说乱道,上天下地!痴头疯闹,不可一世!那顾旁人,皱眉叹气!南无老世尊世尊世尊世尊!南无不渐世尊世尊世尊世尊!南无不渐世尊世尊世尊世尊!”

一看就明白,戴传贤平常不务正业,只醉心于念佛。刘半农的诗,非无源之水。戴就任考试院院长后,把南京鸡鸣山下的一座关帝庙改作了“考试庙”。庙门口站岗的士兵,身上穿的是20世纪的军装,佩的却是周孔夫子时代一样风格的宝剑。庙门是蓝色的,木制的门框和楹联,上面刻着斗大的或碗大的白字,即院长自己的诗句和墨宝。院长办公室旁,设有精致佛堂一座。院长偶然发报,即入佛堂礼佛。院长曾在庙中招待中外和尚,令所属职员以鞠躬谒见诸和尚,这哪是考试庙,活脱脱一个和尚庙!刘诗对戴氏此种做派的描绘,可谓入木三分。

蔡黄虎庭坚于《东坡先生真赞》曾云:“东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仔细寻味,嬉笑含趣味,文章有关怀,如此一来,不拘形式妙文已天成也。